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胡适讲演

胡适著 姚鹏 范桥 编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乙42

3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胡适讲演

姚 鹏 范 桥 编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胡适讲演

著者 胡适
编者 姚鹏范桥
责任编辑 罗林平
封面设计 李萌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门外真武庙二条九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 14印张 305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册 定价：7.70元

ISBN 7-5043-1845-0/I·180

(京)新登字097号



1946年夏，我與家人在南京。左起：二哥、我、大弟、三弟。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编者杂记

1 胡适原名嗣虞，行名洪骍，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后随父母居台湾，5年后父死，母子回到“山清以旷，水环以幽”的皖南绩溪上川老家，入私塾。1904年到上海，先后进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接受新学教育。1910年胡适考取“留美庚款官费生”，离开黄浦江码头，步入美国纽约州绮色佳城的康奈尔大学，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两年后学成归国，应蔡元培之邀，入北京大学任教授。

胡适功成名就后回顾自己发展经历时讲过：“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相信一切没有充分论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早在澄衷学堂读书时，胡适便对赫胥黎的《天演论》爱不释手，深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的浸淫，时髦地易名“适之”，报留美官费生时正式用单名“适”。

“拿证据来！”这是胡适在他全部学术活动中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把赫氏提出的只有证据充分的知识方才可信仰，反则只可存疑，这种存疑主义思想，与我国理学大师的“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在不疑处有疑”的怀疑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思维模式，正是这种“思想习惯”或曰范式，成为他倡导新文化运动势如破竹的“成功之钥”。

2

留美初期，胡适慨叹：“今日大患，在于国人之无思想能力”（《藏晖室札记·胡彬夏女士》）。为了给中国人寻找一种“科学”的思想，他颇费苦心。他在康奈尔大学时就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实用主义）尤感兴趣，后又投身为杜威门下，深得其教，心有灵犀一点通。“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藏晖室札记·自序》）。他把实验主义这种美式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学说，强调的是实验主义学说中的怀疑精神、发展和变革的思想，用以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传统观念，为五四启蒙运动请来“赛先生”和“德先生”，用一种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打倒孔家店”。

“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三论问题与主义》）。正是根据这样一种实验主义的思维范式，他把杜威的五步思想程序修正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在整个一生中，将这十字真言用于文学、历史等学术研究

中，开风气之先。“五四”游行时担任指挥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先生认为，胡适介绍到中国的实验主义，可以“纠正中国一切不着边际浑沌浮乱的思想”；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的《本志宣言》中说：“我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新青年》7卷1号）；贺麟先生称实验主义“曾在‘五四’运动前后10年支配整个思想界”（《当代中国哲学》）。

3 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新民主主义论》）。“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反对党八股》）。

胡适是这场文化革命“首举义旗的急先锋”（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他回国前就与主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书信往来颇稠。他为该杂志1917年1月号寄来《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要解决文学的根本问题；继而又写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大量文章，有力地推动中国封建主义的旧的传统文学观念向民主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的转变，倡导活的文学、人的文学和真的文学。活的文学就是为白话文学正名，将其提高到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是文学形式的革命。人的文学便是提倡人性的解放，反对一切禁锢戕害人性的观念。社会的最大罪恶是：“最

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易卜生主义》）。新文学的内容以人的解放为中心，呼唤人的价值、人格尊严、人的权利等。

真文学即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胡适举双手赞同陈独秀提出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张，他呼吁作家们睁开眼睛看世界，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说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是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易卜生主义》）。

文学革命是扫荡封建文学的革命运动，根植于当时社会现状的需要，但胡适看来：“文学革命论也只是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应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4 胡适将实验主义引入中国，造文学、历史和思想运动的新范式；从文学内容上倡导写实主义和人的解放；尽情地发挥“不疑处有疑”的怀疑精神，继乾嘉学风，在《水经注》、《水浒传》、《诗经》、《红楼梦》，佛教学派等诸多领域，表现出考据、辨伪的真功夫，成绩斐然；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用中西结合的新方法、新眼光、新手段对付三

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头绪，令梁启超诸前辈都赞叹不已，“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整理国故与打鬼》）。这些固然是胡适一生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他最风光的一件事，也就是说他奉献给我们现代文化革命运动最馥香的“兰花”是“白话文学”、白话文运动。

正像当西欧走出中世纪黑暗的峡谷，创造近代文明之际，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尔几乎同时打出怀疑主义旗帜，欲进行思想变革先进行方法革命，即“新工具”“新方法”的出现；同时，他们又在摆脱“死文字”拉丁文上做出表率，他们都是用本民族白话语言从事写作的典范。同样，胡适不无远见而精辟地认识到：“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谈新诗》）。因此，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了作为文学根本问题的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词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五四”前后，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正是在胡适“八不主义”义旗下行进的，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以及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的白话翻译小说，在当时引起振聋发聩的作用，使无数新青年心仪仰服，争相诵读，就连宿学巨擘梁启超也都“欢喜赞叹，得未曾有。”一向反对白话文的章士钊斥责趋之若狂的青年人“以适之为上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章义法，于《尝试集》中

求诗歌律令。”可见，胡适的白话文学、白话文运动不仅在文学形式上震撼了三千年传统文化的结构，而且，从思想，从心理，从精神上挽起启蒙的狂飚。

今日我们能坐享“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主旨的文学革命的成果，自然不该忘却胡适那一批开风气之先的“花工”。“满庭花簇簇，添得许多香”。

5 现在国人津津有味地喝着大洋彼岸舶来的“百事可乐”，也许很少有人知道 70 年前还曾有一听药饮“百事不如人”。

三十年代，胡适有心无心地陷入中西文化论战中，他指责萨孟武等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张之洞所说“中体西用”的翻版（《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也对陈序经的极端全盘西化论的主张持保留态度，认为应该用“充分世界化”、“全力现代化”代替“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胡适针对“五四运动”之后，守旧派试图竭阻西方新思想、新观念涌入而极力推崇中国传统的一些观点，明确地陈述自己的意见：“精神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义。东方人的特点是知足，安于简陋的生活，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安于愚昧；不识不知，不注意发现真理；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而西洋文明的特点是不知足，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钢铁世界、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民权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等。所以，西洋文明不仅是物质的文明，也是精神的文明，我们“百事不如人”。

科学进步的西方确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灾难，但古老的东方文明却未必充盈和諧与诗意。“欧洲的科学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了，几个反动的哲学家，平素饱餍了科学的滋味，偶而对科学发几句牢骚话，就像富貴人家吃厌了鱼肉，常想尝尝咸菜、豆腐的风味。……中国此时还不曾享受科学的赐福，更谈不上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科学与人生观〉序》）既然“百事不如人”，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向人学习。这就是胡适讲的“充分世界化”。

在胡适的思维逻辑中，“百事不如人”、“充分世界化”无论如何都不等同于民族虚无主义。他无情地批判过以孔家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封建旧文化，无情地指摘、挖苦过“读经祀孔”、“孔渣孔滓”，废弃“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等等，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陈中国封建社会种种弊端。但是，他所作所为的目的是想要国人实事求是地反省，以便树立信心，从“低头愧汗”中生发出“迎头赶上”的志气（《三论信心与反省》）。“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情性与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一番科学文化的

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胡适本人确已身体力行他的这套主张。他在把他认为科学的方法论实验主义引入中国的同时，又孜孜不倦地认真整理国故，在中国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红学等方面成绩显著，卓有建树。蔡元培先生称他：“旧学邃密，新知深沉。”

他的口号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新思潮的意义》)。

6 大体上讲，胡适一生是与国民党搅和在一起的。他回国之初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想在思想文化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是这位未能忘情于政治的学者，一次又一次走上他所谓的“歧路”。

“九·一八事变”后，与美英联系较多的胡适受到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器重”，1938年至1942年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他终于抛弃“不谈政治”、“不入政界”誓愿，持令箭赴华府。后来曾多次被荐为行政院院长、考试院院长和副总统候选人。1948年解放军围困北平后，这位北京大学校长才携甲戌本《石头记》飞往南京；1949年4月又凄凄惶惶乘船逃美。晚年他在美国和台湾间频繁穿梭往来，1957年定居台湾，1962年2月24日辞世。

季羡林先生讲过，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他一生中并没有死心塌地拥护国民党蒋介石(《为胡适说几句话》)。季老的评价是对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新月人权事件”。1929年，胡适在上海《新月》杂志陆续发表署名文章《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

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后成集出书《人权论集》。他在这些文章中批评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实行“宪政”之前需有“军政”和“训政”时期的思想，认为这等于取消约法之治，无宪法之训政只是专制。他还反对国民党采取一系列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政策和措施，观点鲜明地指出：“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思想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因此，国民党僵化的思想已经失去了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如果国民党在文化和政治上不尽早改弦易辙，“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当然，勿庸讳言，胡适作为一位受西方思想教育的学者，他的一些观点和主张，曾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他晚年，政治观点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日甚。

与晚年的胡适友情笃深的唐德刚先生给他这样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 50 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胡适杂忆》）。

胡适是一位资产阶级的学者，这是任何人也不能纂写的。但他为现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也是不可

磨灭的，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启蒙大师。虽然说他的西学方法不超过实验主义，中学功底没出乾嘉之外，但是他为了中国摆脱封建旧文化束缚，建设堪与世界强林匹敌的现代新文化，奋举开山斧钺，披荆斩棘、革故鼎新。天理昭昭。

我们同意这样的说法，不对胡适功过作出正确的评价就无法认识我国的现代思想文化史。胡适一生获得欧美诸国36个博士头衔；在中国学术界少年得志，二十几岁暴得大名，涉猎学科广泛，有十项全能之称，为后人留下一大批学术造诣深厚的研究专著和文章。虽说他后半生有点“江郎才尽”之嫌，但仅凭他靠“三分洋货、七分传统”一举获得的成就，就无愧于“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的称号。就连胸怀“横空出世莽昆仑”气慨，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要品头论足的毛泽东，回忆青年时代时也客气地说“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楷模”（斯诺：《西行漫记》）。

胡适留给我们的那些“愈嚼愈有味道”的散文、短论、札记、诗歌、游记、自述等等，可谓：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文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今拙编成集献给读者；不遑作序，杂记概之。

编 者

1991年5月20日

胡适讲演

目 录

编者杂记

卷一

治学方法	1
第一讲 引言	1
第二讲 方法的自觉	13
第三讲 方法与材料	26
历史科学的方法	44
研究国故的方法	47
打破浪漫病	51
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	55
一 病在什么地方	58
二 痘怎样起	61
三 怎样用药	64
四 用药的功效	65

胡适讲演

目 录

卷二

中国禅学的发展	71
导言	71
第一讲 印度禅	73
第二讲 中国禅宗的起来	80
第三讲 中国禅学的发展与演变	89
第四讲 中国禅学的方法	99
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	110
《水经注》考	123
谈谈《诗经》	134
谈《红楼梦》作者的背景	145
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	148
第一幕 老英雄建立大帝国	150
第二幕 老英雄受困两魔王	152
第三幕 老英雄死里逃生	152